

文豪书系

WEN BAO SHU XI WEN BAO SHU XI WEN BAO SHU XI

欧阳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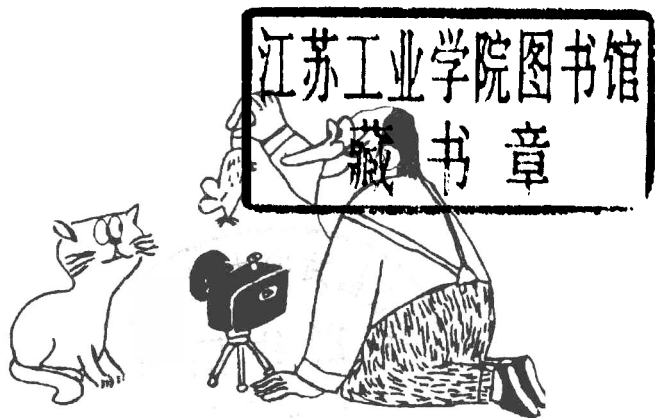


Wen Hao Shu Xi
文豪书系

欧阳修

第 15 卷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豪书系/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247-7

I.文... II.丁... III.文豪—丛书 IV.I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43 号

文豪书系

丁华民 孟玉婷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80.5
字数:3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702-247-7/I·37

定价:936.00元(全36卷)

目 录

欧阳修	(1)
朋党论	(11)
纵囚论	(14)
本 论	(16)
原 弊	(23)
释秘演诗集序	(31)
梅圣俞诗集序	(33)
送杨寘序	(36)
为君难论上	(38)
为君难论下	(42)
张子野墓志铭	(46)
苏氏文集序	(50)
送曾巩秀才序	(54)
与荆南乐秀才书	(56)
五代史·伶官传论	(59)
五代史·宦者传论	(61)
相州昼锦堂记	(63)
王彦章画像记	(65)
浮槎山水记	(69)
丰乐亭记	(72)
醉翁亭记	(74)

秋声赋	(76)
祭石曼卿文	(79)
泂冈阡表	(80)
六一居士传	(85)
伐树记	(88)
养鱼记	(91)
桑怿传	(92)
洛阳牡丹记	(98)
贾谊不至公卿论	(111)
读李翱文	(114)
采桑子	(117)
采桑子	(119)
诉衷情	(121)
御带花	(123)
采桑子	(125)
采桑子	(126)
渔家傲	(128)
踏莎行	(129)
越溪春	(131)
生查子	(133)
渔家傲	(135)
临江仙	(136)
阮郎归	(139)
朝中措	(140)
玉楼春	(142)
玉楼春	(144)
蝶恋花	(145)
蝶恋花	(147)

目 录 *Mu Lu*

蝶恋花	(149)
蝶恋花	(150)
渔家傲	(152)
渔家傲	(154)
木兰花	(156)
浪淘沙	(157)
青玉案	(159)
南歌子	(160)
玉楼春	(162)
少年游	(163)
玉楼春	(165)
望江南	(167)
夜行船	(168)
临江仙	(170)
浣溪沙	(172)
浣溪沙	(173)

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郑氏，立誓守节，亲自教导儿子读书，家境贫困，以至用芦管当笔在地上描画着学习写字。欧阳修自幼就聪敏颖悟，超过常人，书读过就能熟记背诵。等到成年，已有了很高的声望。

宋代立国将近百年，但文章的体裁，还依然沿袭着五代的风气。文人们刻镂雕琢的都是骈偶之文，文坛污浊，文风不振，读书人因循陋习，墨守成规，议论卑下，气调柔弱。苏舜元、苏舜钦兄弟、柳开、穆修等人，都有意振作张扬正气，但力量不足。欧阳修游历随州（今属湖北），在废书篓中得到了唐朝韩愈的遗稿，读后万分欣慕。于是就苦心孤诣地探幽索隐，以至废寝忘食，决心要同韩愈并驾齐驱、比肩齐名。

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得南宫殿试第一，被选拔为甲科，调西京推官。开始和尹洙交游，和尹洙一起写作古文，议论当朝时政，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又同梅尧臣交往，相互作诗唱和，就这样，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名满天下。不久，选进朝廷，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为议论政事被贬了官，朝廷中很多官员都议论相救，只有司谏高若讷一个人认为当贬。欧阳修就写了封信责备他，指责他不复知人间还有羞耻之事。高若讷把欧阳修写给他的信送给了皇上，欧阳修因此获罪，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不久又调任乾德（今湖北光化）县令、武成（今河南滑县）节度判官。范仲淹出使陕西，征辟欧阳修任掌书记。欧阳修笑着推辞说：“从前我

所以那样做，难道是为自己的私利吗？还是同其退不同其进较好吧。”过了很久，朝廷又恢复了他的校勘职务，并被进举为集贤院校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主持谏院。

当时仁宗皇帝更换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做了朝廷大臣，仁宗还决定增加谏官，起用天下名士，欧阳修第一个在被选之列。每次进见，仁宗都要征求主持政事的意见，询问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朝中兴废的事多了，小人们的聚合趋附感到了很多的不便。欧阳修考虑到正直的好人必然不会得胜，多次向仁宗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初，范仲淹被贬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波阳），欧阳修和尹洙、余靖都因为替范仲淹辩白伸冤而被逐，且被看成是范仲淹的“党人”。从此，朋党的说法就开始了，欧阳修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其大略的意思说：“君子 and 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成朋党，小人和小人因为私利相投结成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但我说小人是没有真正的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因为小人所喜好的是名和利和厚禄，所贪图的是金钱和财物，当他们利害一致的时候，就暂时互相勾结拉拢成为朋党，而并非真正的朋党。等到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互相争先，无利可图的时候就相互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为保护，所以说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它们来修身，就不仅志同道合而且还互为裨益，用它们来效忠国家，就不仅同心协力而且同舟共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有臣子亿万个，就有亿万颗心，可说是没有朋党了，商纣因此而亡国；周武王有臣子三千人，三千人只有一条心，可说是大的朋党了吧，因而周王朝得以振兴。这是因为君子的朋党，虽然多也不会嫌多的缘故。所以做国君的人只该贬退小人的假朋党，起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大治了。”

欧阳修评议朝政切要率直，小人们看他似仇人，而仁宗独夸奖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朝服，并且回看着侍臣们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得来？”于是，提拔为同修起居注，又主管起草皇帝的诏令。按照先例，选拔主管起草皇帝诏令的官员一定要经过试用期以后才能正式任命，因为仁宗了解欧阳修，下诏书特地免了这一过程。

后来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自从朝廷对西方用兵以来，议论时政的人就想废除麟州（今陕西神木）以便节省军队的供给。欧阳修说：“麟州是天然的险要之地，不要废除，废除了麟州，那么河内这些郡县的百姓就不能安居了。不如分出麟州的军队，让他们进驻河内的各个要塞，遇到危急也可以互相得到接应和救援，而平时又可以省去辗转运输之劳，从谋略来说，这样做比较有利。”由于欧阳修的这个建议，麟州得到了保存。他又说：“忻州（治所在今山西忻县）、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崞岚（今属山西）多禁地和废田，希望下命令让老百姓去开垦和耕种，不然，就将被敌人占有了。”朝廷把欧阳修的提议交给有关部门讨论，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实行，结果是朝廷每年得到了几百万斛的粮食。凡是河东土地赋税过重，人民无法忍受的摊派，欧阳修上奏朝廷请求免除了十几项。

欧阳修出使回来，正值保州（今河北保定）屯兵作乱，欧阳修被授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他在向天子辞别的时候，仁宗对他说：“你不要做长久留在外面的打算，有什么想说的，说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在谏官任上就该评论朝政，现在我已经不做谏官了，再评议朝政就是越职了，这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没关系，不要因为京官和外官而生出隔阂来。”乱贼平定了，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欧阳修逮捕了冯博文，把他囚禁在监狱里，李昭亮害怕了，马上放出了所有私藏的妇女。保州屯兵开始作乱的时候，官府曾经用投降不杀的诺言进行招安，等到叛乱平定后

却统统把他们杀死了，另外尚有胁从的两千人，本来已经把他们分别编制、隶属到各个州郡里去了，当时富弼是宣抚使，担心这些被编的人以后会再生变故，所以又决定将他们在同一天里全部杀死。碰巧富弼和欧阳修在内黄（今属河南）这个地方相遇了，半夜里，富弼屏退左右，悄悄地把自己的这个打算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说：“灾祸没有比杀死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何况又是胁从的人呢？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如果有哪个州郡不服从你的这个命令，变故起来可不是小事呀！”富弼恍然大悟，因此终止了这个计划。

当时，杜衍等大臣因为朋党之议一个接一个被罢了官，欧阳修愤慨地向朝廷上奏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以重用的贤才，而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应该被免职的罪过。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贤，他们的说法其实也并不复杂。想大批地陷害忠良，不过就是指责他们是朋党，想动摇大臣的地位，就必须用专权来诬陷他们，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除去一个好人，其他很多的好人还在，这对小人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利益；想把好人一网打尽，但好人却又很少有过失，很难一一找到他们的缺点，只有指责他们结为朋党，才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全部贬逐他们。至于自古以来那种已经被皇上了解、而且深得皇上信任的大臣，那么就难以用其他的事由来动摇他们了，只有专权是皇上最忌讳和憎恶的，所以，一定要用这种说法，方可以打倒他们。正直的人士在朝廷，邪恶的小人就会有所避忌，谋臣不被举用，正是敌国的福气。现在这四个正直的大臣一旦罢免，一定会使邪恶的小人相互庆贺于国内，四周的敌人相互称贺于国外，我替朝廷可惜呀！”于是邪党更加憎恨欧阳修，就借他妹妹的孤女张氏的案子罗织他的罪名，把他降为知制诰，出为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欧阳修在滁州住了二年，调任扬州（今属江苏）、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不久，恢复了他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衔，留守南京，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

期满，朝廷任命他为流内铨。这时，欧阳修在外已十一年了，仁宗看到他的头发都已花白，问候慰劳很是周到。小人们害怕欧阳修再次被重用，就有人假造欧阳修的奏章请求仁宗清除内侍中挟持恩宠，为非作歹，用非法手段获取私利的奸徒。这样就激起了宦官们对欧阳修的深切怨怒，纷纷诬陷他，要把他外放同州（今陕西大荔），仁宗皇帝采纳了吴充的意见才得以中止。升任翰林学士，让他修纂《唐书》。欧阳修奉命出使契丹，契丹君主命令四个贵臣掌管宴会，并且对欧阳修说：“这种规格的接待并不是常规制度，只是因为你的名声大，所以才这样做的。”

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贡举。当时应考的读书人喜欢写作险怪奇涩的文章，号为“太学体”，欧阳修极力排斥，贬抑这种文体，凡是写作这种文章的人一概黜落。这件事结束后，从前那些轻狂浅薄的人侦候得欧阳修出门，聚集在一起气势汹汹地拦住欧阳修的马头高声责骂，街上的巡逻队也无法制止；然而科举考试的风气，却从此得到了改变。

欧阳修被封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他继承包拯威严治政之风，用简明便易、遵循法制的原则治政，不求显赫的名声，京师也治理得很好。十个月以后，改充群牧使。《唐书》修撰完毕，欧阳修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当时黄河在商胡决口，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贾昌朝想掘开横垆故道，回折河水使它向东流。有个叫李仲昌的人，却主张把河水引入六塔河。议论的人不知听谁的好。欧阳修认为：“黄河水流多泥沙，按理说来没有不淤塞的，下流既然已经淤塞了，上流就一定会决口。用近来发生的事情去考察，黄河的决口并不是不能努力塞住，故道也不是不能努力恢复，但是这种做法都不是治本之道，因而势必不能保持长久。开掘横垆故道工程很大，但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了，最终还是要再次决口。而六塔河河床狭

窄,令黄河水悉数倾注,滨、棣、德、博各州一定会遭到它的灾害。不如依循河水的走向,增高河堤,疏通它的下游,让黄河之水无所阻拦地流入大海,这才是受益几十年的长久之计呀。”当时的宰相陈执中同意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同意李仲昌的意见,终于造成了河北的大灾难。

谏院论述陈执中的过失,但陈执中仍然拖延着企图稳住自己的官位。欧阳修上书皇帝,认为“皇上拒绝采纳忠告,庇护愚顽的宰相,有损皇上的圣德。”过了不久,陈执中被免去了宰相职位。狄青做了枢密使,很有威望,仁宗不高兴,谣言纷起,欧阳修请求出任外官,以保全自己得以善终。于是就免去了他的朝官而改任陈州(今河南淮阳)知州。欧阳修曾经因为水灾向仁宗上奏疏说:“皇上君临天下已经三年了,但至今东宫太子之位未定。从前汉文帝刚即位,因为臣子们的建议,马上立了太子,因此享国很久长,为汉太宗。唐明宗讨厌臣下议论接班人的事,不肯早早立定太子,因此造成秦王之乱,宗庙社稷由此倾覆。皇上为何犹豫而久久不选定太子呢?”此后立英宗,推究其源,就在于欧阳修的这次上书。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升任为枢密副使。嘉佑六年(1061),为参知政事。欧阳修在兵府时,曾经和曾公亮考核全国的军队数和三路驻守兵员的多少、地理的远近,重新制造了地图和簿籍。凡是边防长久以来没有派兵驻守的,一定进行检阅和补充。他在任执政大臣时,和韩琦同心辅助仁宗。凡是兵民、官吏、财利等中书省应当知晓的重要大事,编集成一个总目,碰到事情就不必临时匆忙地向有关部门了解。当时东宫太子的人选还没有决定,欧阳修就和韩琦等人对这样一件大事协商出了一个意见。宋英宗因为得了病,无法亲自处理朝政。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互相猜忌,制造矛盾,皇帝和皇太后几乎因此成为怨仇。在韩琦奏事的时候,太后哭着向韩琦说了英宗和自己的种种矛盾。韩琦用英宗有病的

理由来进行劝解，太后听了不高兴，欧阳修就进一步劝说道：“太后侍奉仁宗皇帝已经几十年了，您的仁德昭示于天下。以前温成专宠，太后您处置得从容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宽容吗？”太后的情绪稍稍和缓了些，欧阳修又劝说道：“仁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久，他德政的恩泽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所以一旦驾崩，天下奉戴太子，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的。现在太后您只是一个妇人，而我们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意，天下谁人肯听从呢？”太后不作声，过了很久，母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平息了。

欧阳修平素和人相处总是坦率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从不掩饰和隐瞒。等到他执政以后，士大夫们对他有所请求，他总是当面说明可以还是不可以的理由，就是谏院的官员议论政事，他也一定用是非作为标准来责问他们，因此怨恨他、说他坏话的人就更多了。英宗将追封尊崇濮王，下命令让有关部门讨论，都说应当称皇伯，改封一个大国。欧阳修引述《礼记·丧服记》，认为：“身为人子的人，应该替他的父母实行‘报祭’，降服丧三年为服丧一年，而不隐没父母的名字，可是丧服可以降等，但名字是决不可隐没的。如果出嗣的儿子把亲生的父亲改称为皇伯，这种例子就是遍考前代，都是没有根据的。进封为大国的王，但礼制规定又没有加爵的道理。所以中书省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不同。”最后太后写出了手书，允许英宗称濮王为亲，推尊濮王为皇考，三夫人为后。英宗不敢担当。于是御史吕海等人毁谤欧阳修主张这种意见，争论不休，后来吕海等人都被贬逐出了御史台。只有蒋之奇的意见附和欧阳修的主张，所以欧阳修推荐他为监察御史，但是被御史台的很多人看成是奸佞邪恶的小人，蒋之奇为此十分害怕，就想使自己摆脱这种窘境。正好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和欧阳修有仇恨，他捏造了欧阳修家庭生活淫乱的谣言来诋毁欧阳修，这个谣言辗转相传，一直

传到了御史中丞彭思永的耳中，彭思永又把这个谣言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就上奏章弹劾欧阳修。当时，神宗皇帝初即位，心里想重重地谴责一下欧阳修，就去征求过去的宫臣孙思恭的意见，孙思恭替欧阳修辩白解释，欧阳修杜门不出，要求神宗对制造谣言的人治罪。神宗派人诘问彭思永、蒋之奇，追问谣言的出处，彭思永、蒋之奇回答不出来，结果都遭到了贬逐。欧阳修也坚决要求离开朝廷，结果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今安徽亳县）知州。第二年，迁兵部尚书、青州（今山东益都）知州，后来又改为宣徽南院使，兼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欧阳修辞不受命，后又改徙蔡州（今河南汝南）。

欧阳修总是以风骨气节自我制约，但却屡屡遭到污蔑，且年纪已六十了，就一再上表要求辞去官职，神宗帝总是宽慰他，没答应他的辞官。及至出守青州，又因为请求停止散发青苗钱，被王安石所诋毁，因此要求放归的愿望愈发急切。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熙宁五年（1072）逝世，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

欧阳修在滁州时，自号为“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然机关陷阱就在前面，但也能置触发之险于不顾。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放逐，却仍旧是志气自若。当他被贬夷陵时，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就取出积年的陈旧案牍反复观看，发现其中冤屈谬误的地方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道：“一个荒远的山城，尚且如此，天下冤屈谬误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自此以后，碰到狱讼之类的事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疏忽。学者求见，和他们谈话，从来不论及文章，只谈官事，他认为文章只能润及自身，而政事却可以推及它物。他前后历任数郡的长官，不炫耀政绩，不追求声誉，为政宽松而不扰民，所以，凡是他所到的州郡，人民都感到安适。有人问他：“您老治政宽松，而政事却并没有弛废，这是什么

原因呢？”欧阳修说：“如果以放纵为宽，以怠慢为简，那么政事就一定会弛废，而人民也一定会受其弊害。我这里所说的宽，是指政令不苛刻急迫，我所说的简，是指政令不繁杂琐碎。”欧阳修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秉烛夜读公文，屡屡停卷而叹。我问他，他就说：‘这是个死狱啊，我想设法让他能活，不能啊！’我说：‘生可求吗？’你父亲就说：‘做官的人想方设法寻求使死狱者获生的办法而不得，那么死的人和我就都无恨了。而做官的人虽然常常存有使死狱者变活的愿望，尚且会不小心使他死了，何况世上不少做官的常常希望的是治民以死地呢！’他平时教育他的子弟，也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说，我都听得耳熟了。”欧阳修听后终身遵循父亲的这个教导。

欧阳修写的文章，自然天成，或丰满或简约，都符合标准。他的文辞简要，旨意明朗，立论有据，内容通博，旁征博引，引类例举，分析事理至深至透，因此很能折服人心。他超然脱俗，独自奔驰，众人不能相及，所以天下的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尊他为师。欧阳修鼓励提携后进，犹恐不及，凡是被他赏识的人，大多成了有名望的人。曾巩、王安石、苏洵、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当他们还是平民的时候，屏处乡里，不为人知，欧阳修就为他们游说，提高他们的声誉，说他们一定会显名闻达于世。他对待朋友非常笃信诚实，朋友在世的时候举拔扶持他们；朋友去世以后就调理保护他们的家族。

欧阳修喜好古文，爱好读书，凡是周、汉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都要采集收拾起来，研究考核它们的异同，把自己的观点写在左边，明白、昭著可为表证，称之为《集古录》。奉诏修撰《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章法严谨，用词精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论述欧阳修的文章时说：“论大道时像韩愈，议政事时像陆贽，记史事像司马迁，作诗赋像李白。”有识之人以为这是真正了

解欧阳修的人所说的话。

.....

评论：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一直到秦、汉，文章虽然跟着时代而有所盛衰，但它们的语言却都繁富滋润，它们的光泽都灿烂照人，它们的音节都清晰明亮，这是因为还都保留有先王遗留下来的功绩。经过晋、魏，文章就衰弊了，到唐代的韩愈手里，文章重新振兴起来。唐代的文章，经过五代又衰弊了，到宋代欧阳修手里，又再次振兴起来。挽回百川之颓波，平息千古的邪说，使这种文章的正气，可以辅佐大道，可以扶持人心，这都是韩愈、欧阳修两人所作的努力啊！韩愈在政治上没有得到重用，欧阳修得到了重用，但最终还是不能有所作为，这件事真应该被世道惋惜啊！

朋党论

宋仁宗庆历初，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改革弊政，推行新政，起用大批革新之士，朝野上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但是以夏竦（sǒng）、吕夷简等为首的守旧派势力不甘心失势，继续阻挠历史前进的车轮，他们诬蔑攻击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为“朋党”，作者针对他们别有用心的攻击，写了这篇《朋党论》，以正视听。

作者并不回避“朋党”二字，开宗明义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理直气壮，直封对方之嘴。但朋党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以同道为朋”，是“真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是“伪朋”。接着纵论史实，援古证今，阐明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最后指出君主应当对此引以为戒，当此革新进取之时，千万不要为小人的胡言乱语而乱了方寸。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